

11.01

杭州工商史料卷



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26154138

杭州工商史料选

(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)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1987年10月

杭州工商史料选

(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)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36,000

1988年2月 第一版

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3,000

I S B N 7-213-00183-3/K·35

书号：11103·230 定价：1.30元

目 录

- 民国时期的杭州民族工商业概况 阎子 (1)
解放前的杭州工商行业 本会文史编辑室 (10)
1911—1937年的杭州商业市场 董涤尘 (38)
清末民初杭州湖墅的商业情况 陈鼎文 于学勤 (49)
杭州中山中路一条街 童宝泰 陈瑞芝 (58)
- 现代杭州丝绸工业
..... 杭州市民建、工商联文史组 (79)
- 杭州的绸业市场和绸庄
..... 杭州市民建、工商联文史组 (96)
- 杭州丝绸业中的几家有名企业
..... 本会文史编辑室 (109)
- 与杭州丝绸业有关的几个行业
..... 本会文史编辑室 (119)
- 杭州土丝业的兴衰 胡贤熹 (140)
- 民生药厂简史 王雪痕 黄士扬 (145)
1949年前的杭州电厂 陈晴岚 (164)
回忆中华书局杭州分局 朱朗亭 (169)
杭州国货陈列馆 杨积武 娄继心 (175)
杭州亨得利钟表店 娄继心 (179)

- 张允升线帽百货庄 沈长富 徐天庵 (184)
- 杭州最早的市内公共汽车
..... 杭州市民建、工商联文史组 (188)
- 杭州历史上的土纸行业
..... 倪昌龄 魏轩民 冯大森 施炳芳 (191)
- 杭州南北货行业简史 方志高 (196)
- 编 后 (200)

民国时期的 杭州民族工商业概况

閔子

杭州是浙江的省会，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，也是东南各省的交通枢纽之一，工农业产品的集散地。杭州的西湖风景秀丽，素有人间天堂之称，现在是全国的重点风景旅游城市。

自隋统一全国，开凿了江南运河以后，杭州的经济文化逐渐发展。明代已出现靠雇工剥削的“机户”。在1896年甲午战争后，拱宸桥一带被日本帝国主义划为租界，开辟商埠，从此杭州的民族工商业便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摧残。辛亥革命后，铁路、公路交通日渐发达，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，东南各省以及本省内地的丝、茶、米、木材等工农业产品，直接运到杭州，再由水陆公路运往上海等地。往来客商多起来，春秋两季的游客络绎不绝，杭州就成了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。

一

杭州的丝绸工业远在南宋时已初具规模，设有织造院。明末清初改为织造局，专掌织造，供应宫廷之需。当时杭州

的丝绸已负盛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，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，因此杭州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。1912年规模较大的振兴绸厂和纬成缫丝厂相继成立。1915年天章绸厂首先采用了电力织绸，这是丝绸生产上的一大进步。与此同时，原料亦由纯丝改为掺用各种纤维交织，花色品种日渐增多。当时杭州的电机有200台左右，手拉机则在5000台以上。1926年为历史上最好的一年，全市织机约1万台以上，成品内销东北、华北、广东，外销法国巴黎、里昂和南洋各地。震旦丝织厂就在这一年创办起来的。

1929年以后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，资本主义国家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，加上国内连年战争和水旱灾害，农村破产，民族工商业呈现了历史上未有的萧条衰落。自1928年至1929年2月，杭州绸厂停机歇业的有虎林、立新昌、绮新、巨纶、天章、立昌等35家。绸机停歇的从4007张减至1104张，停歇机数为2903台。绸货生产率下降三分之二。1932年，丝绸年产量仅49万匹，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二。1934年以后，生产逐步恢复，至抗日战争前夕，杭州丝绸厂有140多家，机坊4000多户，共有电力织绸机约8500台，手拉织绸机约5000台，月产绸缎约62000匹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，全市共有电力织绸机4000多台，平均每月用丝每台约70余磅，年达350万磅。除三分之一由政府配给人造丝，其余都自行采购蚕丝及其他纤维。以木机和铁机织造绸缎的机户，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业的有2200户，至1946年仅剩1500多户。原因是由于原料缺乏，资金短缺，染炼不精，品质复杂，实销不振，因此恢复较为困难。

杭州除丝绸工业发展较早外，其他工场手工业大都在鸦片战争到同治年间（1840—1874）先后发展起来的。如制作杭州摺扇的舒莲记扇庄，制作各色雨伞的小禅堂雨伞作坊，制作杭剪的张小泉近记剪刀作坊，制作扑粉及蛋形擦粉的孔凤春香粉作坊等。此外，染织布业在宣统年间（1909年—1911年）已有生产，但多系小型家庭手工业；1916年左右，有手拉布机和铁木机近千台。就在这个时期，杭州的棉纺、火柴、造纸等轻工业，亦都改用铁机生产，因此铁机业也随着发展起来。

杭州市四郊的农户，大都栽桑养蚕，由于丝织工业生产技术上的改进，恃丝业为生计的人就多起来。丝绸原料、原料加工、丝绸成品加工等行业亦应时而生。以经纬丝料工业来说，系家庭手工业，分捻丝合丝、络丝、摇纬、整经等部，俗称络经与料房。抗日战争以前，全市有100多家，每家雇工15—20人，以此为业的约1万人。到1946年，已不到十分之二。与此有关系的还有制作丝线闻名的手工作坊。据估计在那个历史时期中，直接或间接依附丝绸为生的，全市约有10万多人。

二

解放前杭州这个消费性城市的商业，主要由如下的三大类构成：经营茶叶、木材、山货、炒货等土特产的，约占全市商业的18%；服务于游客、香客、山客、水客的服务性行业约占23%；一般商业约占59%。

杭州是浙江茶叶贸易市场之一，除本省所产的茶叶外，安徽、福建、江西等省所产的红绿茶，大都在杭州销售或由

杭州出口。抗战前每年销售茶叶在 12 万担以上，远销英国、美国、北非及南洋等地。抗战期间，茶区大部沦陷，茶园荒芜，茶厂倒闭，茶叶损失极为严重，产量仅及战前的十分之二三。以杭州狮子峰、龙井、云栖、虎跑所产之龙井绿茶而言，1946 年前后，年产毛茶只有 600 多担。杭州又是木材的吐纳口，因此杭州的木业成为重要商业。浙东所产木材，均编成木排，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而下，集散于杭州的江干，每年由这里运销各地的木材价值达四、五万两。抗战胜利后，全市木行商业达 126 家。杭嘉湖是浙江的主要产米区，而邻省的粮食调节，都以杭州湖墅珠儿潭为集散地。抗战以前每日平均到货——以米为主，豆为副，约七、八十船，每船自百担至二、三百担不等。日伪占据时期，粮食市场交易陷于停顿。抗战胜利后，在湖墅营业的粮行约 20 余家。杭州市经营土产业的，有山货与炒货两业。山货业以采运笋干、箬叶和茶叶等货为大宗。箬叶年产约 5 万担，杭州经营的占十分之三，其余运销上海，苏州等地。笋干在杭州运销的约 5 千担，除销售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外，还远销北京、天津、东北等地。炒货是以门售香榧、山核桃、藕粉、熏香豆为大宗，战前山核桃年产达 1 万担以上，主要销杭州及沪杭沿线的城市与乡镇。经营以上行业的很多是行家，他们除了抽取佣金外，有时还在收购和代购，业务上凭借旧势力，把持操纵，剥削农民。

服务于游客、香客和一般往来客商的服务性与消费性行业，每逢春秋季节及香汛期间，业务特好，相传为“三冬靠一春”。解放前，杭州的旅馆业是生意兴隆的。其中以西湖区的西冷、大华、新新、蝶来四家专做外国旅客及达官贵人

的生意；市区以清泰第二旅馆为上等，房间最多，具有水汀装置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杭州的旅馆共有140家。民国初年，城站与新市场开辟，各式菜馆先后开设，规模较大的如楼外楼、太和园、天香楼等；一般的菜饭店也很多。1946年共有菜馆73家，菜饭店180家。杭州的茶馆也是一个大行业。解放前茶肆林立，以湖滨的望湖楼，吴山的绿荫茶榭等几家规模较大，夜间都设有歌场。湖上别业如水竹居、坚匏别墅；名胜点如平湖秋月，西冷印社；寺观如虎跑、韬光等处，都有卖茶处。1946年共有160多家。

在一般商业中，杭线、杭粉、杭烟、杭剪、杭扇，称为“五杭”，曾兴盛一时，名噪全国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杭州的百年老店有二、三十家，其中如方回春诚记国药号，据资料记载，开创于1649年；张小泉近记剪号，开创于1628年，都有300多年的历史。

三

抗日战争胜利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。杭州的民族资产阶级怀着很大希望，纷纷集资，修理房屋，添置机器设备，计划经营，重整旧业。可是不到半年，却在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下，受到了新的摧残。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位，和国民党沆瀣一起，展开了经济上的掠夺。借美国的“剩余物资”和“救济物资”之名，以公开的或走私的方式，打进国内市场，致使国产工业品严重滞销，存货堆积，生产陷于停顿，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。为有利于美货的倾销，有利于官僚资本的套取外汇，国民党制

订了“低外汇政策”，这不仅摧残生产，且扼杀了我国的出口贸易。

这个时期，杭州市场也是美货充斥，国产品销不出去，民族工商业走投无路。如牛乳业竟杀掉了四分之一的奶牛，其余的亦大多转到农村去作耕牛。战前日产鲜乳3000磅的西湖炼乳公司，被迫改制绽子油；最后终于倒闭。美国香烟大量倾销，占杭州市场销售量的80%以上，使杭州的5家烟厂由减产而倒闭。美国卷烟纸的大量进口，华丰纸厂的卷烟纸就大量的积压在仓库里。

美货不仅夺去了我国内国际市场，而且极力排挤我国丝茶等特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。生丝出口数惨跌，茶叶大批积压。同时工业原料如美棉、人造丝、烟叶等却源源而来。杭州市棉织品的生产，有60%用的是美棉和印度棉。而美棉与人造丝都控制在官僚资本的“中蚕”和“中纺”公司之手，限制配给；私营工厂不得已只有购买黑市。那时杭州市的丝绸工业不是忙于生产，而是为贷款和配给原料而奔走呼号。杭州的民族工商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。

由于国民党的所谓“币制改革”，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，因此企业的生产资金大量消耗，产品售出以后补不进原料，造成虚盈实亏。加以捐税繁重，使工商业的流动资金更加短缺，而银行资金转向投机，不再提供生产资金的借贷，因而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的盘剥。杭州当时的利率，月利竟高达9分至1角8分。不少企业处于职工工资与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的境地，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纷纷倒闭。如杭州丝织工业，在1948年仅有机坊1300户，绸厂600多家，铁木机6000多台，估计全年产量只有50万匹，仅占战

前的五分之二。当时 300 多家布厂中，开工的不过十分之二，产量不及战前的十分之一。茶厂开工的，不及战前的四分之一。具有较大规模的武林烟厂，因资金亏耗殆尽而宣告闭歇。

在解放前的最后几年，民族工商业已奄奄一息，而投机性的行业却畸形发展。为投机服务的银行、钱庄却增加到 62 家，服务性的旅馆、菜馆等行业增加到 2260 家，占商业总户数的 22.7%。当时的黄金、白银、粮食、棉纱成了主要的投机对象。纱布厂放弃了生产，进行纱布的囤积投机，以商养工。那一时期的工商业情况被概括为三句话：“工不如商，商不如囤，囤不如投机”。粮食业也不顾民食的需要，大量囤积居奇，激起了市民的公愤，从 1946 年到 1948 年，先后发生了三次全市性的打米店的风潮。

四

解放前的杭州是一个消费性城市，因此商业在经济上占有很大比重，其中服务性行业又占整个商业中的相当比重。在解放前的 11910 户工商业中，工业仅 2904 户，占 24% 左右；商业有 9006 户，占 75% 左右。工业分散落后，设备简陋得可怜。如在机器铁工业中，除了大冶等四、五家能够仿制绸机、布机外，其余都只能从事一些修配业务。商业却拥有一个很大的摊子，其中服务于游客、香客、山客、水客的服务行业有 2046 户。至于供应城乡或工业需要的商业，如煤油等等，不仅为数寥寥，而且都是买办性的，为外国洋行倾销；而销售生产工具的商店，却一户

也没有。

从杭州的丝、绸、棉纺、茶叶等工业来看，无论在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上，很大程度上都依附于洋商买办或封建地主而生存的。如原材料销售上，丝绸业有44%是依赖意大利、日本进口的人造丝；棉纺业有60%依赖美国、印度的棉花。其他如火柴的原料氯酸钾，造纸原料漂白粉和纸浆等，都要依靠外国供给。而绸缎、茶叶等产品，则又以外销为主，内销部分也是以官僚地主为主要对象。民族工商业对外国的依附性，从一些行号的名称和商标上也可以体现出来，如解放前的70家新药店中，就有22家以“中美”、“中法”、“中英”等作店号。

民族工商业同时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，作为官僚资本的附庸。在1914年，杭州机器铁工业创办最早的武林铁工厂，由于受到封建官僚投资的大冶铁工厂（1920年）的排挤，业务一落千丈。这也说明民族工商业如得不到官僚资本的支持就遭到失败。杭州民族工商业与封建势力的渊源关系还表现在对企业的投资方面。一些较老的商业企业如胡庆余堂国药号、宓大昌烟号、高义泰布店，以及酱酒业的“十大家”等，都是由官僚地主创办的；很多工业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。他们除了经营工商业，还开设钱庄控制市场。

正由于杭州是一个消费城市，因此居间商多，投机性大，对上海的依附性也大。杭州作为居间行业的有蚕行、丝行、茶行、粮行、木行、山地货行等20多个行业。这些行家一般都没有资金，依靠代客买卖，坐收佣金。并在价格、运输等方面，从中操纵垄断，买空卖空，牟取暴利。杭州以

买空卖空为经营手段的纱布号，在市场上的影响很大。此外从事其他经营的，不论是工厂、商店，都不在乎商品的成本，只希望能掌握市场物价的变化而进行投机。不少行业，如五金、百货等的货源大都来自上海，因此价格随“串盘”而涨跌。上海的部分工商企业，在杭州设立分支机构，杭州较大的厂商，也在上海建立了“申庄”，并利用对讲电话随时探听上海行情，施展各自的经营手段。

由于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和我国所处的历史地位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所走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，要求发展就更加困难。作为消费性城市的杭州民族工商业，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。

这份史料是根据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们的回忆，以及现存资料整理而成，只是粗线条的画出一个解放前杭州民族工商业的轮廓而已。

解放前的杭州工商行业

本会文史编辑室

杭州被誉为“天堂”，西湖风景秀丽，既是游览胜地，又是一个消费城市。杭州的工商各业都是随着这个城市的特点而相应发展，因此城市的工商业布局既具有与其他城市相同的共性，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。

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时期，工商各业深受敌伪摧残，幸存者亦濒临破产。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，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与杭州市政府先后复员，处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局者认为“世难渐纾，一切安定，庶几百端具举，而工商亦不难并进”。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曾这样说过：“工之利在生产，而生产视供应为贏绌；商之利在供应，而供应视生产为盈虚。无工则商无所运其技，无商则工无所致其用。”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杭州市商会会长金润泉动员全市工商业者或从外地将企业迁回杭州，或迅即筹备恢复企业生产，使杭州经营趋于繁荣。

据1945年杭州市商会的调查，当时杭州市工商业共分26类，113个行业。在解放后的1949年底，杭州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接收的杭州市同业公会共有126个，其中商业公会115个，工业公会11个。会员1万多家。有了较大的变化。

这里我们将1945年的调查材料作了较系统的整理，类目照旧，提供参考。

金融业

银行 杭州市银行事业，创始于清光绪33年的浙江兴业银行。民国以后，除中央、中国、交通、农民均设有分行外，商业银行年复增加。1920年成立银行公会，1930年改组为银行业同业公会。1937年冬抗战军兴，大部份停业。抗战胜利后呈准国民党财政部，领到营业执照复业或新设者，至1947年8月止，有国营6家，省营、市营、县营各1家，商业15家，均加入中央银行所办的票据交换所，并与银业联合交换票据。放款对象颇殷实，除江海银行受总行影响停业外，各家业务均极稳健。此外设有四联浙江分处，由张忍甫担任主任委员，其目的在集中四行两局的力量，进一步协助政府推行金融政策。

钱庄 杭州市钱庄的性质，有汇划与贴兑之别。汇划庄以向各地汇划大宗款项及放款为主；贴兑则除放款外，兼营门市兑换，亦与外埠往来。战前有钱庄65家，复员后经财政部批准给照者，有钱业公会旧会员26家，战前未入会的钱庄8家。各庄业务，以稳放为主，均能略获盈余。杭州市的钱业公会成立于清季，组织严密，规模完备；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3月恢复成立。以后还组织实务研究会，业余进修社，并创办钱业小学。

保险 保险是近代专门业务之一种，其业务包括水、火、人寿、信用、意外、运输等。杭州市战前以外商保险公司业务为盛，其后华商急起直追。抗战胜利后，凡执有前工商部实业部执照，或曾向经济部登记的保险公司，方得注册营业。已入公会的总公司及代理处已有26家。各会员公司接受水火等

保险生意，除依保险法、保险业法施行法外，其保价照苏浙皖京各省市火险保价规则、火险实价施行办法、以及中国棉花保价规率等条款办理，赔款由公证评断。战后房屋缺乏，房产货物价值增高，业主对于保险颇为关心，故业务发达。

典当：典当在抗战前杭州原有19家，战后因当帖利息及典当开支，超过当货之月息，人民又往往当后无力取赎，又因服装式样不时更换，使满货销路呆滞，经营者得不偿失，故并无一家复业，仅新设二、三家而已。

交通业

运输 杭州市为沪杭、浙赣两大铁路线衔接之处；京杭、沪杭、杭徽、杭嘉、杭甬、杭桐公路起点；钱塘江水运通浙东、皖南，内河通浙西苏沪。交通线密如蛛网。各地的土产外运，及上海之进口货输入，均以杭州为集散地。因此杭州的过塘运输事业发展较快，范围亦大，大多自备运货汽车，或与汽车及货车公司订约联营。对于客货的起卸驳运，报关纳税，保险押运，都派员迅速稳妥办理。有的甚至供给客商膳宿，代为垫款，服务周到。因此虽铁路办理营业所后，运输业业务仍未衰落。过塘与运输分隶于两个同业公会，但过塘业大都兼营运输。

汽车 杭州市汽车事业，除官营的省公路局行驶各路线的长途客货车外，商营公共汽车有2家，出租汽车有13家，另有运输汽车，及汽车材料行业。行驶各路线载运客货，组有同业公会。

轮船 杭州市的轮船业，因水位关系，在杭州湾吨位较